

征服的挽歌

侯文蕙

東
出
版
社

X-01
2104

征服的挽歌

——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

侯文蕙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侯文蕙.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10

ISBN 7-5060-0685-5

I. 征...

II. 侯...

III. 环境政策-美国-研究

N. X-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366 号

征服的挽歌

ZHENG FU DE WANG E

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

侯 文 蕙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63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060-0685-5/X·4 定价: 11.00 元

征服的挽歌（代序）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美国人的环境意识则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随着美国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过程；因此，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本书力图用这样一种观点，去考察美国人的环境意识的变迁及其特点。

本书分四个阶段论述 18 世纪后期到现在的美国人的环境意识：

一、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期：这是一个进步与荒野之间的两难抉择时期；美国人试图依赖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去建立一个可以避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病的理想社会；并力图按照个人的意愿去实现各人的梦想。美国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美国梦想的物质基础，大自然成为他们索取和征服的对象。扩张和征服是这个世纪里由一个无人指挥的乐队所演奏的主题；但从其喧嚣中也可辨出其间所夹杂的浪漫曲，亨利·大卫·梭罗是一个最出色的吟唱与自然的同一性的浪漫主义歌手。

二、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是进步战胜荒野之后的反思时期；国家权力力图去担当演奏征服的凯歌的乐队的总指挥，欲求用科学的指挥棒使它的旋律统一，并使其更为雄壮有力；

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展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人希望改变时代乐曲的征服主题，而代之一首荒野交响曲；约翰·缪尔是希望把这支交响曲推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使者。

三、20世纪30—40年代：这是科学进一步发展，从而能使更多的人去冷静和客观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期；尘暴使征服的旋律变得低沉和萧瑟，阴晦的山谷中回响着被征服者悲哀而骄傲的噪叫；但是，很少有人懂得它的内涵。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第一个去仔细倾听并去理解其内涵的人。

四、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是人们经历了环境危机，并尝到征服苦果的觉醒时刻；是一个新的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环境意识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雷彻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宣布了人类征服自然时代的结束。“地球日”是人们追求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更文明更进步的时代的开始。绿色、和平是时代的最强音。

我的书，不能为新时代吹起号角，但希望为我们——人类曾经为之自豪过的，并因之取得了今日进步的，但又为了未来而在今日被抛弃的“征服”，唱一首挽歌。

侯文蕙

1995年6月22日于青岛浮山下

目 录

征服的挽歌（代序）	(1)
-----------------	-----

第一部分 两难之间（18 世纪后期—19 世纪中期）

第一章 田园	(1)
第二章 一个康科德人	(9)
第三章 田野里的浪漫主义者	(27)

第二部分 荒野在呼唤（19 世纪后期—20 世纪 20 年代）

第四章 变革和失落	(51)
第五章 荒野的儿子	(62)
第六章 自然保护主义者	(82)

第三部分 像山那样思考（20 世纪 30—40 年代）

第七章 尘暴	(101)
第八章 一个少数派	(110)
第九章 沙乡的沉思	(129)

第四部分 别无选择（20 世纪 50 年代—）

第十章 自大的社会	(149)
-----------------	-------

第十一章	更高的需求	(156)
第十二章	寂静的春天	(167)
第十三章	意识的变革	(181)
第十四章	展望	(190)
附录 1	美国有关环境的立法	(198)
附录 2	美国群众环境组织	(201)
附录 3	美国五个群众环境保护组织成员的年度增长情况表 (1966—1975)	(203)
附录 4	与环境有关的国家机构	(204)
参考书目		(206)
后 记		(214)

第一部分

两难之间（18 世纪后期 ——19 世纪中期）

从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期，在北美大陆，白人已逐渐取代了印第安人在这块土地上的位置，并在上面建立起了一种全然不同于它的旧主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美国人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和欧洲完全不同的社会，但却沿袭着他们从欧洲带来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它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也表现在与自然的关系上。杰弗逊似乎已看到了资本主义人际关系的残酷，从而希望能借田园生活的温情去平抚它；但是，他从未出现。在他的国家，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他的哲学，只是人的哲学，它未给自然留下位置。尽管他也研究自然，但是为了人去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那是一个强调征服的时代，是 500 年前培根的理性精神在新大陆的延续。

但是，就在那个时代，也有强调同一和融合的观念，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就试图在资本主义文明使人们远离自然时，让自己回到自然。他在接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进化论的影响，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一套虽不系统，但却有超前意义的生态观。

第 一 章

田 园

在欧洲人眼里，直到 18 世纪末，北美大陆仍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希望的大地。18 世纪 80 年代，法国人克雷夫克尔（Michel-Guillanne Jeande Crevecoeur）从美国写道：

“苦难的欧洲人，欢迎你来我的岸上；当你看到我的翠绿的田野，航运畅通的河流，美丽的山村时，赞美那个时刻吧！你若工作，我给你面包；你若诚实、清醒、努力，我给你更大的报酬——安定和独立。我给你衣食，我给你安逸的家，让你在炉边讲给孩子们听，你是如何发达起来的；我给你一张可以酣睡其上的床。此外，我还要给你一个自由人享受的豁免。你去工作吧，去耕耘吧，你会发达的，只要你公正、勤劳和知恩图报。”^①

克雷夫克尔原是一个法国军官，1765 年在纽约定居，结婚，并有了 3 个孩子。他在那里置办了一个农场，耕耘、写作，度过了 10 年美好的时光。独立战争打破了他田庄的宁静，他不得不离开了美国。他把自己在那 10 年中写成的文稿卖给了一个伦敦出版商；1782 年，此稿以《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为题出版了。这本书一出版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克雷夫克尔也因此而声名大振。

1783 年，克雷夫克尔以法国驻美国的总领事的身份来到纽约，在那里住了 7 年。当他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已死，农场

被毁，3个儿子寄宿在朋友家里。即便如此，克雷夫克尔对美国的深厚感情并未丝毫减退，他不仅为促进法美的友好关系做了杰出贡献，而且还与托马斯·杰弗逊，后来的美国总统，以及华盛顿、富兰克林等著名人物结成了朋友，与杰弗逊的友谊更深一层。1790年，克雷夫克尔因健康原因回国，但仍不辍写作，后来又出版了两本书；1813年去世，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在自己的书中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主，他却并非是一个只管耕耘的头脑简单的庄稼汉。他在《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中通过对美国社会、政治和风情的描写，表达了他对一个平等、自由和平的农业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注入了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自18世纪以来，许多英法哲学家们都把美国当成一个可以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的地方：在一个新的未被人的贪婪、惰性所玷污的环境中，可以建立一个在欧洲无法建立的社会。

在美国革命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的这一信念则更被托马斯·杰弗逊具体化了，1787年，托马斯·杰弗逊出版了他的《弗吉尼亚记事》。实际上，这本书在前几年就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杰弗逊国内外的朋友中和大学生中广泛流传了。这本资料丰富、推论严密的弗吉尼亚自然历史论著，原是应法国驻费城的公使秘书在1780年提出的有关问题而写的，当时美国独立战争正处在危机之中，法国对这个新的共和国的前途怀有疑虑。杰弗逊在这本书中不仅处处表达了他对这个年青的共和国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热情，而且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勾画了他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蓝图，提出了他对在美国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的理想。他说：

“希望我们永远不再看见我们的公民坐在工作台边或转动纱锭。农村还是需要木匠、泥瓦匠、铁匠的，但是，从总的制造业经营来看，还是让我们的车间留在欧洲吧。最好是把粮食和原料送给那里的工人，而不是让他们带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原则来这

里寻求粮食和原料。”他认为，只有那些在土地上耕耘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使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真正而实在的美德，道德败坏只发生在“那些依赖顾客的损失来谋求生存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不像农民那样“看重天国，看重土地的勤奋。”而且杰弗逊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有生气，关键在于这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它们就会像溃疡一样侵蚀到这个国家的核心——法律和宪法之中。从欧洲的经验看，工商业不仅给欧洲社会带来了贫困和腐败，而且还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定；因此，为了不步欧洲工业化的后尘，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它的母国的社会——农业民主主义社会。^②

杰弗逊坚信，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他说：“在欧洲，土地不是已经被耕种了，就是被禁止耕种；因此，不得不凭借制造业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我们有无限广阔的土地期待着农民去耕种。”因此，“在欧洲，最需要重视的是土地，因为劳动力是充足的；而这儿，最需要重视的是劳动力，因为土地是充足的。”^③政府要做的只是如何通过教育去提高人民的社会觉悟和自身素质，并为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为保护他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去提供有利的条件。

“土地是充足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1611年，弗吉尼亚总督托马斯·迪尔说：“把最强大的4个基督教国家加在一起，也无法和这个地方相比，无论是出产，还是土地之沃，都是如此。”1620年，“五月花”号船上的清教徒们，也正是在对这个富庶的大陆的朦胧的期望中，漂洋过海，历经了艰辛，登上了现在麻塞诸塞州的科德角海岸的。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来到这里，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克雷夫克尔说，美国大到可以容纳“每一个人”；如果他需要没有耕种过的土地，那么“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自己就会呈现在面前。”^④

1800年，杰弗逊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在任期内，杰弗逊的重农思想有所改变，因为他认识到，要保证美国在经济上的独立，没有一个强大的工商业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已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但从内心深处，杰弗逊并未抛弃对工商业的偏见；对他来说，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一直是他的梦想，农业的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

但是，美国经济在客观上并不是按照杰弗逊的设想来发展的，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蓬勃兴起。在安德鲁·杰克逊任总统期间（1829—1836），杰克逊曾试图恢复杰弗逊式的民主和重农精神，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

杰弗逊的民主精神对他那一代，甚至后一个世纪的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按着他的精神提出的政治分权思想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一直是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的基本施政原则；人们对土地的渴望和在新的条件下开始新生活的欲望也一如既往。19世纪蓬勃发展的西进运动就是具体体现。到18世纪后期，美国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已基本上被移民们占据；当新来者们发现最好的土地已被占有之后，他们便继续向前，开始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俄亥俄河和田纳西河流域，浩浩荡荡的人流从东向西涌进。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发扬着他们的祖先从欧洲带来的理性精神，忍受着艰辛，经历着困苦，向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发起进攻。荒野、森林和阻挡他们占领新土地的印第安人，都是他们征服的对象。

广阔的北美大陆原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但到1800年，原居住在东部的印第安人的数字已经大减。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也包括与白人的摩擦；但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1600—1800年间，这期间印第安人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传染病——由白人从欧洲

带来的各种疾病：天花、伤寒、鼠疫、疟疾、流行性感冒……传播这些疾病的病菌，通过白人做为贸易交换的各种物品，如毛毯、衣服、器皿以及各种小玩意儿，带给了从未得过这些疾病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对这些病毫无免疫力，又无医药，结果往往是死亡，甚至几乎是整个村庄的毁灭。据统计，在 1600—1675 年间，在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从 70000 多人降到了 12000 人，在某些地区，情况还要严重，如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印第安人的数字从 10000 降到了 500。^⑤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1620—1653）威廉·布雷德福在他的《普利茅斯史》中，对受着天花折磨的印第安人的惨状曾作过具体的描述。

疾病使白人把印第安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和家园。在印第安人的村庄一个个消失的同时，白人的定居点却越来越多；在原来印第安人进行市集、打猎、捕鱼和农作的地方，出现了白人的篱笆、农田、家畜和住房。著名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就是原来印第安人种植玉米的地方。

进入 19 世纪以后，随着白人对土地需求的增长，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便成了公开的劫掠，“把印第安人赶出去”，成了一个口号。1830 年，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按照这个法案，东部的印第安人必须放弃他们的家园，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并被许诺住在那里。永远永远……直到“青草不再生长，河水不再流淌”。从 1831 年起，大迁徙开始，印第安人扶老携幼，带着他们尽可能带的行李物品，被迫离开了他们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一路上因饥饿、寒冷和疾病而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遭到了许多印第安部落的抵制，甚至武力反抗，但都失败了。其中抵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切诺基人，但在联邦军队的押解下，他们于 1838 年被迫离开了佐治亚。在他们抵达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俄克拉荷马时，已有 1/4 的人死去。

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的斗争(塞米诺尔部族)一直延续到1842年。美国军队为镇压塞米诺尔人的反抗耗资2000万美元,死亡1500人。塞米诺尔人在斗争中同仇敌忾,誓死不屈。女人们为了和男人们一起战斗,为了免去后顾之忧,甚至杀死了自己年幼的孩子,表示了决一死战的豪愿,他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因为力量悬殊,再加上敌人的离间计,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所有的部族都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即使那些曾经协助过联邦政府的人也不能幸免。

白人取代了原来印第安人在这块土地上的位置,在上面建立起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着自然环境。在他们眼里,这里同大陆上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相比,似乎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甚至,他们奇怪,为什么在这样富庶的土地上,印第安人会过着那样穷困的生活。他们不明白,印第安人对土地和他们的生活要求有着一套完全和欧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印第安人把土地看作是他们的母亲,是他们生活的依赖;而欧洲人则把土地看成是财产和可以获得利润的资本。他们一旦有了土地,便竭力榨取地力,从不施肥,也不管理,节省投资。一旦地力耗尽,他们便抛弃它们,转向寻找新的土地。19世纪初期,许多外国的旅行者都为美国农民对土地的漫不经心而感到震惊。

1775年,一个不署名的英国旅行者写道:“新英格兰被开垦的土地状况在英国会被认为是它们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是,在这儿,一切都是因为漫不经心造成的。”瑞典旅行家彼得·卡尔姆在目睹了美国农民如何在耗尽土地的地力后,把它们变作牧场,同时又去毁林开荒的情况之后,警告说:“这种农业虽然能延续一段时期,但它以后所产生的恶果,将会是有目共睹的。”^⑦甚至杰弗逊也批评过美国农民对土地的滥用。无怪乎人们会这样评论美国:“一个富裕的民族成了一个浪费的民族。”^⑧

美国人在他们富庶的土地上编织着各自的理想，但同时，更把这块土地当做他们征服的对象，并在这个征服的时代里显示人的力量。这是一个充分表现自我和自我意识的时代。

亨利·大卫·梭罗也在寻求自我，但却使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并产生了一种不同的自我意识。

注 释

- ① 《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美)柯恩编 朱立民等译，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54 页。
- ② 托马斯·杰弗逊：《弗吉尼亚纪事》W·W 诺顿公司 1954 年版第 165 页。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Thomas Jafferson W·W Norton & Company, Inc.)
- ③ 同上书，第 164、85 页。
- ④ 戴维·M·波特：《富裕的人民：经济富裕和美国人的性格》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79 页。
(People of Plenty: 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David. M. Pot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ogo Press 1954)
- ⑤ 威廉·克劳农：《土地的变迁：印第安人、殖民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学》，希尔与王公司 1983 年版第 88—89 页。
(Changes in the Land :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William Cronon Hill and Wang 1983)
- ⑥ 卡罗琳·麦钱特：《美国环境史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D·C 希恩公司第 135 页。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mental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 Carolyn Meschant D. C. Heath And Company) .
- ⑦ 同上书，第 156 页。

第二章

一个康科德人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生前并不出名。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20多部著作,生前却只出版了两部,其中一部是《沃尔登》,——今日有200种不同的版本,并被译成了不同文字^①,被称为美国划时代的作品,——当年只印了2000册,花了5年时间才售完。他去世时,他的同时代人、著名作家和超验论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曾说:“美国人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国民。”^②的确,因为他留给人类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几乎到一个世纪后才为人们真正认识。

*

*

*

1817年,亨利·大卫·梭罗出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的一个铅笔制造商的家里,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即回到家乡;先做了几年小学教师,后又帮助父亲制做铅笔。有一阶段,他曾专门研究这门手艺,制造出了一种可以和任何最好的伦敦产品相媲美的铅笔。当别人认为他应该去申请这项技术的专利时,他却又去试探新的东西了。后来他又做过工地测量员,当然也是临时性的。他似乎更期望成为一个诗人,但从未成功过。他对大自然有着特别的爱好,除了写作和为谋生做必要的工作外,他把大

部分时间都用来漫游和观察自然。他从不去教堂，也从不参加选举；他未婚，也不富有；而且，他从未想过要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一切，在康科德这个以勤俭为美德的新英格兰小镇里，不仅被当作怪事，而且也决不会被视为高尚，可是令他的同乡们更感到离奇的是另外两件事：

1845年，正当美国人都在庆祝他们的独立日时，梭罗却离开了镇子，搬进了树林——距离康科德中心两英里的沃尔登湖畔。他自建了一间小屋，并在房子周围开了一片地，种了玉米、豆角和土豆，在那里度过了2年2月又2天，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1846年，即他搬到沃尔登的第二年，又因为拒交人头税而被关进了监狱。这两桩事，当时在康科德确实轰动不小，使他在乡民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一个愤世疾俗的隐士。但实际上，这些事情的表面下掩盖着深刻的内涵。

一、超 验 论 者

康科德距波士顿只有20英里，是当年独立战争的最初战场。在它北部的卡莱尔桥头上，至今还镌刻着爱默森为纪念那次战斗写的诗句：

“这里，就在这跨过溜溜水流的桥边，
曾经是武装农民坚守的地方，
他们的旗帜曾在这里，
在4月的微风中飘扬，
就在这里，
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枪响。”

这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地方，但又是一个保留